

用典释义

天下之本在家。

【讲话原文】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家”。尊老爱幼、妻贤夫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耕读传家、勤俭持家，知书达礼、遵纪守法，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是家庭文明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

——习近平《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2016年12月12日）

【出处】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战国）孟子《孟子·离娄上·第五章》

【解读】

“天下之本在家”是由孟子“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化用而来。

《孟子·离娄上》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在孟子看来，天下是由各个诸侯国组成的，因此天下的根本在于诸侯国；各诸侯国是由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许多家庭构成的，因此诸侯国的根本在于家庭；而家庭又是由每一个具有独立个性与人格的个体所组成的，因此家庭的根本在于个人。孟子在家与天下的关系上强调二者的一致性，《孟子·离娄上》还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是“己一家一国”三位一体。《礼记·大学》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在儒家的社会和谐模式中，“齐家”是“治国”和“平天下”的重要环节。家，既是己的依托和归属，又是天下之根本。家齐了，国也就治了，社会也就和谐了，天下也就太平了。因此，家庭的和谐稳定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爱子，教之以义方。

【讲话原文】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们从牙牙学语起就开始接受家教，有什么样的家教，就有什么样的人。家庭教育涉及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是如何做人的教育。也就是古人说的“爱子，教之以义方”，“爱之不以道，适所以害之也”。青少年是家庭的未来和希望，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古人都知道，养不教，父之过。家长应该担负起教育后代的责任。家长特别是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很大，往往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画荻教子讲的就是这样的故事。我从小就看我妈妈给我买的小人书《岳飞传》，有十几本，其中一本就是讲“岳母刺字”，精忠报国在我脑海里留下的印象很深。作为父母和家長，应该把美好的道德观念从小就传递给孩子，引导他们有做人的气节和骨气，帮助他们形成美好心灵，促使他们健康成长，长大后成为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

——习近平《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2016年12月12日）

【出处】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宠而好兵，公弗禁，庄姜恶之。

石碏谏曰：“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弗听。

——（春秋）左丘明《左传·隐公三年》

【解读】

“爱子，教之以义方”语出《左传》，意思是爱护子女，就应当用做人的正道加以教导。

据《左传·隐公三年》记载，卫庄公过分宠爱嬖妾所生之子州吁，对其百般放纵，竟将兵权交给这个尚无名分的庶子。卫国大夫石碏认为若继续宠溺州吁，必将导致祸患，劝告卫庄公要约束州吁的行为。石碏认为“宠子”不等于“爱子”，只有用正确的规矩和道理教育孩子，不让他走上邪路，才是真正的爱子。他劝谏卫庄公说：“骄、奢、淫、佚（同‘逸’），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骄、奢、淫、佚，是走邪道的开始；而这四种恶习之所以发生，都是由于宠爱和赐予过多的缘故。成语“骄奢淫逸”即由此而来。

遗憾的是，卫庄公并没有听从劝告，结果导致州吁恃宠而骄，日益骄奢淫逸，在其异母兄卫桓公继位后弑君篡位。石碏只得联合陈国国君将其杀死。

（杨立新）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多次谈及理想和纪律问题，并把它们称之为“我们的真正优势”。坚定理想信念是我们战胜艰难险阻的根本保证，严明纪律是实现理想的重要保障，团结一致是顺利推进建设和深化改革的基本前提。

吴泽群

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有理想，有纪律，这两件事我们务必时刻牢记在心。讲话节选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目为《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今天读来，仍然可以给予我们诸多深刻启示。

时代背景

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之所以强调理想和纪律，既是针对全社会思想政治状况而言，也是针对党内存在的问题而言。改革开放初期，国门打开后各种思想思潮扑面而来，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这里面既有真知灼见的学术成果，也有暗藏祸心的歪理邪说。社会上一些人的思想受其影响很大，如何应对确实值得思考。

邓小平曾说，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对于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可能出现各种问题，党中央保持了清醒头脑，并有充分估计。党中央对一些错误倾向及时采取了一系列坚决和果断的措施。1983年10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决定用三年时间，完成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的整党任务。《决定》列举了“三种人”，严重的经济犯罪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以权谋私、严重损害党和群众的关系的人；长期在政治上不同中央保持一致、或者表面上保持一致实际上另搞一套的人等。邓小平指出，所有这些，都是党内的

危险因素、腐败因素，是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的严重表现。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农村改革取得一些成效的基础上，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正式启动。如何确保党的奋斗目标如期实现，党中央提出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同时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

主要观点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的邓小平，深知中国共产党靠什么才能生生不息、永葆朝气。改革开放后，他多次谈及理想和纪律问题，并把它们称之为“我们的真正优势”。

坚定理想信念是战胜艰难险阻的根本保证。邓小平指出，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邓小平还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严明纪律是实现理想的重要保障。邓

小平指出，纪律和自由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两者不可分的，缺一不可。没有理想，一切向钱看不行；没有纪律，搞以权谋私、化公为私以及其他种种不正之风也不行。共产党员一定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无论是不是党员，都要遵守国家的法律，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党的纪律里就包括这一条。遵守纪律的最高标准，是真正维护和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国家的政策。

团结一致是顺利推进建设和深化改革的基本前提。坚持理想和纪律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团结奋斗。邓小平指出，没有纪律，就会像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能成功的。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就指出，要团结一致向前看，要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首先要加强全党的团结。1985年五六月间，他又指出，没有理想，没有纪律，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内部就成了一个乱的社会，不是一个安定的社会，什么建设都搞不成了。

重要启示

时代发展进步了，一些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一些痼疾也在翻新变样。今天，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and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但我们仍然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要教育和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用理想和纪律最广泛最紧密地团结起来，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加强理想信念教育，补好精神上的“钙”。一段时间以来，由于社会思潮多样多变，各种思想交流交锋日益明显，一些错误思潮对部分党员干部的思想行为产生了消极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锲而不舍、一以贯之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各族人民不断前进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全体党员必须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义坚定信念不动摇，大力倡导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只有如此，我们党才能永远保持先进性纯洁性，才能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带领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风险和考验。

增强法律意识和纪律观念，确保社会安定有序。有了理想，还要有法律纪律作保障。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党的纪律建设，越要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纪律是管党治党的尺子，要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把纪律挺在前面。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制度建设取得丰硕成果，党的纪律更加严密严肃，党风政风带动社会风气日益好转，赢得了人民群众更多的信任和拥护。

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形成全党全社会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凝聚和团结一切积极力量共同奋斗。应该说，理想信念不坚定、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好人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拜金主义等等，严重破坏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侵蚀党的执政基础，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危害极大。邓小平曾经强调，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呐！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应继续依靠理想和纪律的“真正优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重读經典

以有进也。”因此，在他看来，读书为学当以居仁由义、达道至德为旨，当以安身立命、经世致用为志，旨明志立而后才能真正有所自得。

三

就为学的内容而言，张栻所言之“学”包括人伦道德之理与修齐治平之事两面。他认为：“学之所务，果何以外于人伦哉！”并指出：“夫民人社稷，固无非学，而学固不独在于书籍之间。”所以，依张栻之见，为学既包括读书明理的活动，亦涉及为人处世的方面；既涵盖内圣成德之教，又兼摄外王经世之治。当然，对他而言，“为学之要，不越乎修德讲学、徙义迁善而已”。

在为学的方法上，张栻尤为强调“反本务实，知行并进”。他认为，为学求道者应当“以务实反本为要”，应当“致知力行，趋实务本，不忽于卑近，不遗于细微，持以缜密，而养以悠久”，而不能骄矜虚浮、好高骛远。

所谓“反本”，是指为学应当首先于本源处、本根处下功夫。“本”在张栻这里，一指仁心、仁道、仁德，二指修身正己之事。他说：“道莫不有本焉，务其本则为善学者矣。盖人道以亲亲为大，而莫先于孝亲者。……身者，天下国家之本也。有以守身，则其所施皆是理也，然则乌往而不得其所守？”若就人伦道德之理而言，则亲亲之仁当为首重，故要明人伦、尽人道，就应当以事亲为先；若就修齐治平之事而言，则修己治身乃为本要，故立家、立国、立天下皆须以修身为本始。这即是说，为学求道应先于人伦之本根处着力，于世事之切近处下功夫，不可舍本逐末、浮游无根。若本根不立，则读书为学终究只是表面功夫，难以真正有所进益。所以张栻慨叹道：“本乎本乎！学者其不可务乎？”

“务实”也是张栻在为学功夫上所特别注重的一点。在他看来，儒学是“真可以经世而济用”的“实学”，而“实学贵于践履，隐微之际，无非真实”。既然如此，那么研习儒学、体究儒道，就必须重视躬行实践。否则，就是“骄矜浮虚不务实者”，这些人是无法论说儒学的。张栻曾对当时儒林内部所存在的贪高慕远、空谈虚论的虚浮学风作了大力批判，如其“窃虚声以自高，而不克践其实”“妄意高远，不由其序，游谈



相夸，不践其实”等论述，即是就士人们空谈心性的问题而发。针对这一问题，张栻主张学者们应当“略文华、趋本实，敦笃躬行，循序渐进”。其所谓“务实”，不仅强调于人伦日用当中实践履履，而且强调依循始终条理渐次升进。他说：“所谓循序者，自洒扫应对进退而往皆序也，由近以及远，自粗以至精，学之方也。如适千里者，虽步步踏实，亦须循序次而进。”因此，唯有既身体力行而又循序渐进，才能务实；唯有务实，才能明道识理、积善成德。

张栻固然强调“学贵力行”，但他并未轻忽“致知”的重要性，而是认为致知与力行相辅相成、互促互发，二者应当兼用其力而不可有所偏忽。他说：“致知力行，互相发也。盖致知以达其行，而力行以精其知……”又说：“知之进，则行愈有所施；行之力，则知愈有所进……盖致知力行，此两者工夫互相发也。”显然，在他看来，致知、力行之间乃是相互依存、相互促发、相互成就的关系。正是基于对知行关系的这样一种辩证认识，所以张栻主张“致知力行，学者所当兼用其力”。当然，他所说的“知”“行”主要是就道德修养功夫而言的，在此意义下，二者的互动关系更为紧密。